

# 东南亚华人社会次群体认同的建构 ——以新加坡“外江之众”三江移民为例的分析

夏培根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文学暨社会科学院, 新加坡 117570)

[关键词] 新加坡; 三江移民; 华人社会; 传统帮群; 认同构建

[摘要] 论文从三江社群内部总会—公团联络机制之形成、三江社群对外多元合作关系之运作、新加坡建国前三江认同之构建三个方面, 论述了新加坡三江移民的社群发展和认同构建。作为19世纪末方涉足此地的新客群体, 三江帮移民于发展初期规模甚微、势力孱弱, 且被视作有别于闽、粤、潮等传统帮群的“外江”社群, 却通过开展一系列有益社群发展的在地实践, 逐步嵌入新加坡本土华人社会权力格局, 并构建独特的三江认同。不过, 随着社会变迁与国家政策的调整, 三江社群也面临认同延续的挑战。

[中图分类号] D634.33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26)01-0074-11

## The People from “Outer River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Sam Kiang Immigrants in Singapore (1898–1965)

XIA Pei-gen

(Faculty of Arts &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117570)

**Key words:** Singapore; Sam Kiang immigrants; 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unity; identity construction

**Abstract:** Since the British founded Singapore, dialect-based clans as whole had functioned as a cornerstone of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Traditionally, numerous clans provided vital support to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SCCCI), aiding its efforts in unify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amplifying overseas Chinese influences both locally and globally. Arriving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Sam Kiang immigrants comprised a group distinct from Fujianese, Cantonese and Techow migrants, who used to dominate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t the beginning, the Sam Kiang immigrants were small in number and marginal in public influence. Nevertheless, they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local power structures and eventuated a unique Sam Kiang identity in Singapore. Through examining the Sam Kiang immigrants' series of initiatives in community-building, this paper seeks to unvei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m Kiang community from 1898 to 1965, when it finally acquired informal political domination embedd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收稿日期] 2024-08-18; [修回日期] 2025-9-10

[作者简介] 夏培根(1996—), 男, 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博士候选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华侨华人史、浙南区域史。

1819年，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将新加坡辟为自贸港，而后开启了新加坡现代化发展之历程。新加坡华人社会于19世纪末已形成较具规模的五大传统帮群——闽、潮、广府、客、琼。<sup>①</sup>各帮群将之势力嵌入新加坡本土乃至亚洲各地的商贸、文教、种植业等跨区域网络中，并自视为“内江”人，而将来自浙江、江苏与江西等地的三江帮新客移民称作“外江人”。19世纪末，初抵新加坡的三江移民，人口稀少、势力羸弱且在语言交流上难以与内江帮群甚至帮内人士沟通。然而，《南洋商报》于1965年刊登一则关于三江人士首次当选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副会长的新闻，显示“外江之众”业已嵌入由传统帮群所构建起的本土权力格局，此即三江社群影响力提升的里程碑。<sup>[1]</sup>时至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将新加坡三江会馆定义为华族七大会馆之一，以此对三江认同之现实价值予以肯定。<sup>[2]</sup>鉴于此，19世纪末至1965年间，新加坡三江移民如何从被排除在外的“他者”发展为嵌入本土社会的核心参与者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学者们不仅关注移民群体迁移的动因与策略，还通过考察华侨华人群体的在地实践与跨域活动，揭示其与国家政治、侨乡社会以及经贸网络的复杂互动关系。<sup>[3]</sup>这一研究范式突破传统宏观叙事的局限，为理解移民的主体性和文化网络提供了全新视角。近年来，有关东南亚华人移民的研究在两个方向上取得重要进展。一方面，学者们对以往研究中过于强调国家因素和推拉理论的局限性进行反思，特别是对忽视移民个体主观能动性的研究提出批评；另一方面，这些研究突破传统的“移居地—祖籍地”二元框架，转而聚焦华人移民的灵活应对策略，展现多维度、多层面的华侨华人历史图景。<sup>[4]</sup>而19世纪的华族帮群与20世纪的总商会则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研究所青睐的主题。<sup>[5]</sup>既有学术成果将总商会视为新加坡帮群传统的延续，并揭示其在新加坡华社中的领导地位与所掌握的“非正式的政治权力”。<sup>[6]</sup>此外，伴随着跨国主义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国际移民研究中，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华侨华人复杂的跨域流动、多样的迁移策略，以及跨国网络的营建等议题皆受到关注，推动了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sup>[7]</sup>但相较于传统帮群，新加坡三江社群不论在华侨华人史研究，还是东南亚研究中都未受到足够重视。<sup>②</sup>

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援引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所藏报刊、总商会及会馆所收之特刊名录与年度报告书、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所录之口述音频，以及官方档案、年鉴等历史材料，探究新加坡建国前（1898—1965）三江社群内部总会—公团联络机制之形成、对外多元合作关系之运作以及三江认同之构建，从而呈现三江移民的社群发展与认同构建，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并为东南亚华人社群次群体的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 一、三江社群内部总会—公团联络机制之形成

在早期东南亚华社中，“三江”是长江下游的地缘标签，并被视为“外江”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与流经闽、粤、桂三省之“内江”相对。<sup>[8]</sup>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三江帮人士主要来自江浙一带，但随着华北、华中等地新客移民日渐增多，新加坡时任三江会馆会长陈来昌便于1927年将“三江”之地理范围从长江下游推扩至覆盖华南、华中、华北的宏大区域，以吸纳更多移民加入社群。下文将从三江帮移民的来源与定居、人口与行业以及总会—公团联络机制三方面来梳理该群体的内部发展脉络。

---

① 殖民地政府于1881年起对本地方言群进行分类统计。关于传统帮群的介绍，可参见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年，第36~43页。

② 学者们常将之作为新加坡通史或新加坡帮群研究中顺带一提的“其余”部分，而鲜少开展专门的学术讨论。例如，崔贵强在介绍五大帮群后，只以“至于来自温州与上海等地人士，1901年的人口调查，尚未有列出该方言群的人数统计，可见那时该方言群的移民尚少”作结（《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第43页）。又如，张晶盈仅提及三江会馆作为“扩大版的同乡会”一语（张晶盈：《华侨地缘性社团与传统宗教的渊源及互动——以东南亚为例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50~58页）。

### （一）来源地与居住区

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英殖民地政府看来，“华人移民”（Chinese immigrant）是指乘坐载客人数超过二十位的“移民船”自中国前往英属殖民地，且非为一等或二等舱乘客的群体。<sup>[9]</sup>这主要是指代彼时南来的契约劳工，而厦门则是他们离开中国的口岸。<sup>[10]</sup>而江浙一带人士多经由上海出海，再与内江移民一道途经香港转至南洋。<sup>[11]</sup>为求入境便利，三江移民时常冒充上海人身份，以减少口舌之劳。<sup>[12]</sup>正如上海公会会长陆才奎所言，“当时参加上海公会的人，有很多温州人、宁波人、江苏人和江西人”。<sup>[13]</sup>

时至 20 世纪 20 年代，华人移民“如注般向南方泻流”<sup>[14]</sup>，三江移民亦随之抵达星洲。内江帮群皆有标志性的居住区，并以祭祀空间作为其在地发展的基石。与之相似，三江移民首先于 1898 年购置位于惹兰利茂（Jalan Rimua）的坟地以安葬南来后不幸殒命的同乡，并将之命名为“三江公墓”。<sup>[15]</sup>随着新客移民南来愈众，来自浙江宁波的傅竺贤便于 1906 年倡建位于惹兰安拔士（Jalan Ampas）的“三江公所”以联络本地同乡，傅氏任公所首届会长。而后，第二任宁波籍会长陈来昌又于卡佩芝街（Cuppaga Road）二号再添一处会所以便同乡联谊，并在 1927 年将之更名为“三江会馆”。此处馆邸沿用至 1946 年，终为第三任江苏江阴籍会长杨惺华改迁至圣多马径（St. Thomas Walk）23 号，新馆邸则一路见证了新加坡独立、星马合并与破裂，再至建国。相较于内江社群所聚居的新加坡河南岸，即所谓“大坡”，身为外江人的三江移民则居住在被称为“小坡”的新加坡河北岸，尤其是东陵乌节路一带。由此，内江与外江移民便以新加坡河为界各自发展。而三江会馆馆邸之更替趋势亦是逐渐嵌入本帮移民的居住区，以达到联络乡情、吸纳会员之意图。

### （二）人口构成与行业分布

相较于闽帮数以十万计的人口，三江帮人口规模至 20 世纪 30 年代仅有几千人，以至于在帮群人口统计时，其常被归入五大内江帮以外的“其他”一项。<sup>[16]</sup>以帮内人口最多的温州籍移民为例，其在 1936 年人数为四五百人，仅占本地华族总人口的 0.1%。<sup>[17]</sup>时至 20 世纪 50 年代，其人口虽增至 3000 余人，但其占比仍不足 0.5%。<sup>[18]</sup>与此相较，三江帮人士在总商会中的人数占比却大幅增加，其规模从 30 年代的不足 10 人（约占总会员数 2%）发展为新加坡建国前夕的 200 余人（占 11.6%）。<sup>[19]</sup>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三江移民对参与当地公共事务的热衷。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女性移民人数增加以及男性劳工入境受到殖民地政府限制，新加坡华社中性别比例日趋平衡。三江移民性别比例亦符合此种发展趋势。以温州籍移民为例，1927 年，女性移民仅有个位数，不及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女性移民人数则有近千位，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sup>[20]</sup>

在社群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性别比例逐渐趋衡的同时，其行业分布也展现出日益多样化的特征。木器家私与成衣洗衣是早期三江移民赖以维持生计的行业，其中“温州木工”与“上海家具”在新加坡华人历史记忆中是代表三江帮社群的符号。据统计，20 世纪上半叶，温州移民中有超过九成人口从事木材加工行业。此外，新加坡本地沿街可见的上海家具行，有八成为温州人所开设。此外，三江帮人士还在建筑、文教、影视等行业崭露头角。“文人”形象亦随南来作家之足迹而流传于新加坡华社，如徐志摩、郁达夫等皆为三江人。<sup>[21]</sup>总之，三江移民在新加坡建国前的行业特点可概括为，以从事木器家私与成衣洗衣者为最众，在其他行业的涉足也日渐多元与广泛。

### （三）社团组织与联络机制

随着三江帮人口规模扩大，行业分布多元，其内部社团组织之建设亦如火如荼。由于三江移民之人数远少于传统帮群，而来源地却更为多样，故其无法像内江人那样利用方言来区分同乡。<sup>[22]</sup>即便同为浙江移民也无法理解彼此方言，更遑论整个三江社群，故业缘、地缘纽带便成为早期移民成立十大社团（见表 1），发展三江社群的基础。此外，与长江下游区域相关的社团，其名称中的地缘标签通常精确至府州（市）一级，而在该区域以外，社团名称则多涵盖多个省份。这种命名方式反映了三江社群在新加坡建国前仍以长江下游移民为主体的特征。

表 1 新加坡建国前三江帮社团组织

名称	创立时间	创立地点
三江会馆	1906	惹兰安拔士
上海公会	1911	南京街上段
温州会馆	1923	惹兰勿刹 150 号
南洋华北同乡会	1935	谐街
江西同乡会	1935	惹兰勿刹 249 号
宁波同乡会	1937	大坡海山街 23 号
上海西式女服同业会	1938	登路 97 号
星洲华侨干洗公会	1946	仰光路
两湖会馆	1947	丹戎巴葛 67 号
南洋湖北天门会馆	1964	樟宜路 50 号

资料来源自彭松涛：《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文献出版公司，1983年；《上海公会昨晚庆祝成立廿五周年》，《南洋商报》1935年12月29日，第7版等。

总会—公团联络机制被刊登在今日三江会馆的官方网站上，用于描述以三江会馆为总会余下社团为公团的从属关系。<sup>[23]</sup>然而，这套联络机制并非肇始于19世纪末，而是随着社群发展的动态需求而逐步形成的。在日军入侵新加坡前的新闻启事中，三江社群皆是用“公团”或“团体”来称呼包含三江会馆、温州会馆、宁波同乡会在内的三江社团，并未提及“总会”概念。<sup>[24]</sup>而在刊登于报纸的社团名单中，常有其他三江社团列于三江会馆之前的情况。<sup>[25]</sup>1941年日本入侵新加坡前夕，三江社群内的各社团纷纷组织“集体疏散联防自卫会”以撤离同乡。<sup>[26]</sup>彼时，杨惺华仅是以“团体”来称呼其他三江帮社团。而在战后的新闻启事中，三江帮人士已用“属下公团”来称呼其他帮内社团。<sup>[27]</sup>值得注意的是，当1964年印尼与马来西亚爆发军事冲突时，总商会组织团结大会，其间亦强调三江社群内部的此种从属关系。<sup>[28]</sup>由此可知，总会—公团的上下从属关系尚未体现于日本入侵新加坡前的三江社群内部联络机制中。这套联络机制在战时方成为一个随着社群需求逐步演变的历时性建构产物，并在20世纪下半叶逐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所接受。其形成不仅依赖于社群内部主动的组织协调，还深受外部历史环境的推动，尤其是在危及帮众生命安全的区域冲突中得以强化。在战后和平时期，这一机制进一步发展帮助社群解决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稳定框架，例如，在资源分配、联合举办活动和争取政治话语权中发挥重要作用。<sup>[29]</sup>

## 二、三江社群对外多元合作关系之运作

自19世纪末以来，三江社群逐渐融入新加坡本土社会，除建立内部联络机制外，其还通过与总商会、本地其他社群以及域外三江社群的合作，逐步壮大自身的影响力。下文将依次从三方面分析多元合作关系的运作机理，重现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动态轨迹。

### （一）与总商会的合作关系

三江社群与总商会的合作关系从其与新加坡华人社会以及中、英两国政府的互动中得以体现。比如，在与英国政府的合作中，代表新加坡华社利益的总商会负责举办欢迎英国皇室成员及官员的庆典仪式，而三江帮人士则作为参与者身处其间。总商会“与政府极力合作，以改进本地情形”的策略为其获取领导新加坡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威，而三江社群也借此建立与殖民地政府的联系。<sup>[30]</sup>再如，三江社群亦频繁参与总商会组织的向祖籍地同胞提供援助的活动中，如参与总商会组织的“公

债劝募委员会”“新嘉坡豫陕甘三省旱灾筹賑会”等公共事务。<sup>[31]</sup>

长期的合作经历使总商会领袖意识到三江社群的重要性。1933年，总商会董事们一致决议招徕南来三江移民入会，以“集中人材，团结精神，融洽感情”，同时与三江代表商议若三江帮会员人数增长至10人以上则可增设1个三江帮董事席位。<sup>[32]</sup>经三江帮领袖陈来昌“介绍三江帮人士加入为会员”，总商会遂于次年为三江会员设立董事席位。在1935年的选举中，三江会馆会长陈来昌顺利当选总商会董事，这也标志着三江社群从身处权力格局之外转变为构成新加坡华人社会权力格局的要素。<sup>[33]</sup>而后，历任三江会馆会长皆在总商会董事会中占有席位（见表2）。这不仅显示三江帮会员对会馆领袖的认可，也反映总商会将三江会馆会长视为联络三江社群的媒介。

表2 任总商会董事的三江帮领袖

董事名（生卒年）	祖籍地	会馆职务
陈来昌（1886—1965）	浙江宁波	三江会馆会长（1927—1936）、总商会董事（1935—1937）
杨惺华（1893—1953）	江苏无锡	三江会馆会长（1936—1952）、总商会董事（1937—1952）
王相贤（？—1975）	浙江宁波	宁波同乡会会长（1939—1941）、三江会馆会长（1953—1967）、总商会董事（1953—1968）
邵逸夫（1907—2014）	浙江宁波	宁波同乡会会长（1937—1939）、总商会董事（1956—1958、1960—1962）
汤景贤（1896—1974）	江苏吴县	三江会馆董事（1957—1967）、总商会董事（1956—1967）

资料来源自新加坡三江会馆：《三江百年文化史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三江会馆，2001年，第42~43，118~123，139~141，145页等。

自获得总商会董事席位后，三江社群一方面继续支持总商会所举办的活动，<sup>①</sup>另一方面则强化其与总商会的合作深度，如将会馆作为总商会举办活动的场所等。<sup>[34]</sup>同时，为解决“战后复兴时代”之亟需，总商会有意扩大会员规模与会费收入，而新会员多来自三江帮。<sup>[35]</sup>三江社群之所以积极参与总商会组织的公共事务，在于其发展初期相较于传统帮群在东南亚拥有的雄厚资本，尚处于资源积累的弱势阶段。为此，三江社群需要依托总商会的本地权威与跨国网络来扩充自身实力并提升影响力。然而，随着战后大量新客移民加入，三江社群的规模不断扩大。“新血”比例的增加也对传统帮群主导的权力格局形成了挑战。<sup>[36]</sup>

在1958年的总商会换届选举中，因福建帮会员人数激增，筹委会决定将其董事席位从13席增至16席，同时减少潮帮、埔帮及三江帮各1席。<sup>[37]</sup>三江会馆会长王相贤认为，应按祖籍地分配席位，并提出三江覆盖多个省份，理应增加席位。<sup>[38]</sup>与此同时，闽帮冒名入会的事件在选举期间引发更大争议。<sup>[39]</sup>王相贤多次致函总商会要求调查，甚至提出带领三江会员退会。<sup>[40]</sup>然而，总商会董事坚持依章程行事，最终未满足三江帮的诉求。<sup>[41]</sup>可见，随着总商会规模扩大、会众增多，其内部本就复杂的权力关系和帮群问题愈发显现出矛盾激化的趋势。而作为一个不断壮大的本地华族势力，三江社群在20世纪50年代的权力格局中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其话语权较内江社群明显不足，以至于在选举风波中所有诉求皆被驳回。此次事件让三江社群更加积极争取本地权力以摆脱边缘化处境。如，三江帮人士曾在1964年踊跃加入总商会，截至当年10月申请人数高达1208位，仅次于闽帮的1554位，被指“有意问鼎商会新会长席位”。<sup>[42]</sup>然而，董事会决议规定入会未满三个月者无选举权，即这批新会员无法在隔年年初行使投票权，这导致1100余位三江帮申请者撤回入会志愿书。<sup>[43]</sup>从“激

<sup>①</sup> 对日本入侵中国的谴责，详见《中国非反日乃反对日军阀》，《南洋商报》1937年9月3日，第6版。组建援助英国筹賑会，详见《援英义捐委会星华组首次会议》，《南洋商报》1939年9月24日，第5版。

流勇进”到“急流勇退”，总商会于三江人士而言不只为扩大社交网络，还为获取由传统帮群长期掌控的权力。正是通过这样的尝试，三江帮逐步扩展其影响范围，力图在传统帮群主导的华社结构中为自身争取更有利的地位。1965年，在汤景贤获得总商会副会长职位后，三江社群设宴庆贺，并强调“这不仅是汤氏的光荣，也是三江同人的光荣”。<sup>[44]</sup>“功在社会，誉满三江”的目标终因总商会与三江会馆的执事关联之形成而得以实现。<sup>[45]</sup>

## （二）与本地其他社群的合作关系

作为非传统方言帮群，三江社群在其发展初期因人口稀少、资源有限而处于边缘地位，但其通过与其他帮群建立合作关提升社会名誉，由此融入华人社会。为提升中国商品在南洋地区的知名度与销量，同时维护华商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市场，总商会于20世纪30年代组织国货扩展推销大会。在此期间，三江社群积极与其他社群合作，共同推动国货的推广与普及。这种合作不仅帮助三江社群在华社中建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也展示其为华社公共利益做出的贡献。除参与这类由总商会组织的筹赈祖籍地、接待访新外宾的活动外，三江社群的跨社群合作还体现在策划跨国活动的事务中。太平洋国交讨论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是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其致力于探讨太平洋沿岸各国间的多元问题，与会人员多是各国、地区的精英代表。1930年，新加坡华人社会因有意推选代表参加此会，并由总商会组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筹备委员会”，以率众公选，而三江帮则作为除五大帮群外的第六大帮群团体参与其间。<sup>[46]</sup>总之，在支援祖籍地、应对殖民政府以及提升国际化的过程中，三江社群与其他帮群的合作展现出资源互补、共同发展的特点，而总商会是其与各社群得以建立合作的媒介。

1929年，为欢迎英国皇子访新，总商会领导华社举办提灯会，并设立“闽帮”、“潮客琼帮”、“广帮”三支迎宾队伍，分别于各帮居住区出发。然而，华社内部就三江帮队伍归属问题发生争执，经讨论最后将“帮”改为“部”，以鼓励非内江帮人士参与活动，而三江人士则被划入广帮社群的队伍，被安排至粤海清庙集合。<sup>[47]</sup>这一方面说明19世纪的帮派问题并未因总商会的成立而消弭，而是成为潜藏在公共事务中的敏感社会话题随时引发争议。另一方面反映出三江社群的边缘化处境。不过，三江社群在接待非闽粤桂籍的华人外宾方面展现了独特的地缘优势。不论是迎接浙江籍官员还是上海代表团，都对提升社群本土声誉有所裨益。<sup>[48]</sup>同时，这种接待活动也为三江社群搭建了文化桥梁。通过接待外宾，三江会馆得以推广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和地缘认同，加强祖籍地与移居地之间的联系。换言之，接待活动不仅是三江社群内部整合的体现，也是其在发展初期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寻求发声的策略性举措。

祖籍地的政治局势与殖民地的华族共同利益是战前促进三江社群开展跨社群合作的契机，而自治化和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运动对新加坡公民意识的唤醒则是三江社群投身战后跨社群合作的新因素。例如，在1962年公民投票前夕，三江社群与广东会馆等团体联合发表声明解释新马合并方案，并鼓励公民投票支持特定方案以为华族争取更多利益。<sup>[49]</sup>这些跨社群合作策略推动三江社群逐渐摆脱边缘化地位，成为新加坡华社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与外埠三江社群的合作关系

在1963年新加坡脱英之前，新加坡三江社群与域外三江社群的互动较为有限，主要体现于三江领袖的殡葬活动或会馆新屋落成仪式上。<sup>[50]</sup>这种互动形式虽不频繁，但作为礼仪性活动，反映三江社群在跨域交流中的地缘纽带和人情网络的传播与延续。脱英后，这种互动逐渐向更实质性的合作方向发展。在新马合并的历史背景下，新加坡三江社群与大马其他三江社群积极筹备成立大马地区的三江总会，以壮大东南亚三江社群的影响力。1964年末，筹建马来西亚三江总会的议程由汤景贤、王相贤等新加坡三江领袖发起，并组建筹备会以“促进该总会及早完成三项计划，即颁发学生奖学金，创办三江中学，并建筑新会所”。汤景贤在动员大会中致辞：“三江人人口在马来西亚虽不算多，但三江人在这里很多是有成就的。我们大家都是本邦的国民，应该自己团结，以自己的团结力量作

更进一步的努力，作本邦的一项贡献。”<sup>[51]</sup>可见，新的联邦国民身份是这一时期新加坡三江社群赖以维系的身份认同，也是其与新加坡以外之三江社群建立合作关系的纽带。而后，各地三江社群共同组织多次会议，以协商筹建事宜。然而，随着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自立为国，这种跨域合作因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中断，标志着三江社群跨域合作的阶段性结束。合作中断不仅体现了区域政治变革对华人社群互动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三江社群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的策略调整。

总之，通过与总商会的合作，三江社群逐渐从“他者”转变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组成部分。这种合作不仅为其创造参与公共事务的契机，还帮助三江社群融入新加坡华社的权力格局。同时，与本地其他社群的合作，则推动三江社群从权力格局的边缘迈向权力中心。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文化活动和商业合作，三江社群逐步确立其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的地位，成为影响社会政策与社群发展的关键力量。此外，与域外三江社群的跨域合作不仅维系海外三江社群在构建祖籍社区方面的紧密联系，还使新加坡三江社群在东南亚甚至国际事务中扩大影响。在新加坡建国前，三江社群凭借其建立的多元合作关系，塑造自身在本土华人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并为其从区域网络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历史路径。

### 三、新加坡建国前三江认同之构建

身份认同是构建海外华人社会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对内部联络机制的形成还是外部合作关系的建立，其都发挥关键作用。下文将探究三江公墓、三江公学以及三江社团三类机构在构建三江认同方面的功能。

#### （一）三江公墓与先贤记忆

新加坡华人社团的发端多是为筹购坟山以埋葬客死他乡的同胞，而三江公墓既是三江移民在新加坡社会的社群象征，也是三江认同得以构建的文化基石。自1898年以傅竺贤为首的三江移民购置三江公墓后，三江移民又于战后建起供奉土地菩萨的福德祠与静山亭，以此扩大三江公墓的空间。当新加坡政府征用公墓土地以“充作现代建设”时，三江人士表达抗议，并强调公墓对三江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可替代性。<sup>[52]</sup>可见，三江公墓不仅是一个埋葬之地，更是三江文化认同的象征。

相较于传统帮群发展出强大的祭祀圈，三江社群所经营的福德祠并未形成跨社群的影响力。三江人士定期在静山亭开展春秋祭活动，以实现祖籍文化的传承与三江认同的强化。静山亭的春秋祭活动以追忆先贤、凝聚社群为核心，亭柱刻有楹联“四明子弟立异帮义重身勇财汇祖家，三江土地照同人志壮心坚名扬蛮方”。“四明子弟”与“三江土地”的对举展示三江社群的祖籍发源与地缘纽带，成为三江认同的基础。而从位于中国的“祖家”南迁至“蛮方”之目的，则是为求汇财与扬名。凝聚文化认同的春秋祭由此成为推动三江社群发展的精神动力。1936年，当三江公墓墓道因失修而面临废弃风险时，中国马戏团三江籍负责人主动报销建筑款项，并举办义演活动。1952年，36位三江木匠历时两年合力雕刻佛龕一尊，供入福德祠。通过长期开展祭祀仪式与兴修公墓设施，三江移民对祖籍地文化的记忆与对三江认同的认知得以延续。不过，龕门边柱上所刻联语“莫待春秋祀，方才正心诚意，福焉能求”却也反映出三江人士在祭祀方面的消极态度。这种消极态度可能源于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基督教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泛传播对三江移民的传统信仰产生影响，削弱了民间祭祀活动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新加坡的既有祭祀圈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三江移民，使得三江社群所奉神祇鲜为同乡所祭拜。

#### （二）三江公学与文教事业

1928年，在傅竺贤的倡议下，三江会馆附设的三江公学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三江社群在教育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建校之初，三江人士寄望于通过文教事业的发展，实现“三江人材辈出，且多能热心毅力，从事社会公益事业”，进而“利益华侨”。<sup>[53]</sup>这一愿景不仅彰显三江社群对教育价值的

高度重视，也表明他们试图通过教育推动社群的社会地位提升，以实现“名扬蛮方”的目标。同年，永和艺术团义演五天，将所筹款项六成用于赈济山东灾民，四成支持三江公学的建设，以解三江社群燃眉之急。<sup>[54]</sup>然而，三江公学在战时因动荡局势而停办。1951年，三江会馆董事们倡议复办学，并为其提供物质资源支持。杨惺华提出，“现因学生数日渐众多，除三江同侨之子弟外，其他各省籍侨胞之子弟也都纷纷请求入学，势非扩充教师不可。”<sup>[55]</sup>通过扩大校舍，公学所收学生数量也有明显增长。至1954年，三江公学学生人数由复办之初的数十人增至230余人；到1958年，学生人数已达到500人。<sup>[56]</sup>

作为三江社群唯一的教育机构，三江公学不唯在培养后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成为凝聚三江社群、延续三江认同的重要载体。在办学初期，公学以招收三江子弟为主，并特别强调“外江籍”的身份认同。<sup>[57]</sup>在三江会馆的支持下，公学分发奖助学金、津贴与组织社群节庆活动，使三江子弟意识到地缘纽带的重要性。而随着时间推移，三江公学逐渐成为东陵区域闽粤籍侨童的重要教育机构。这一开放政策不仅展现了三江社群的包容性，也通过教育传播三江文化价值，使得“三江”这一身份逐渐超越地缘属性，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对外江以外的学生身份认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此同时，三江领袖对办学的长期支持也让学校成为塑造三江认同的空间。从陈来昌支持创办三江公学，到杨惺华战后重办学，再到王相贤鼓励公学参与总商会举办的华校董教代会和教师节祭孔大会，历任三江会馆会长不仅深化公学的纵向发展，也通过教育平台将三江社群的横向社会影响力扩展。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公学为三江社群延续认同、提升地位、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作出重要贡献，是三江移民不断融入新加坡社会的缩影。

### （三）三江社团与地缘纽带

除依靠三江公墓、三江公学的发展来延续三江认同，三江社群还借助各社团的媒介功能，进一步强化地缘纽带，巩固三江认同的基础。三江社团内部的地缘纽带在总会—公团联络机制形成之前便已存在。三江社群发展初期，江浙人士占据主导地位，而来自华中、华北地区的移民由于人数较少，相较于前者，其往往处于边缘社群的边缘。为改变这一状况，陈来昌在担任三江会馆会长之初便提出涵盖黑龙江、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大三江”概念，以取代此前狭义的、仅指长江下游的“小三江”。<sup>[58]</sup>这种符号改造为拉近不同区域移民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并有效吸纳更多新客移民，将其纳入三江认同的框架中。

这一策略的实际成效在20世纪30年代的移民潮中得以体现。随着中国北方移民南来新加坡的人数逐渐增加，华北移民因“言语隔阂、遇事协助亟感不便”，遂成立华北同乡会，后定名为南洋华北同乡会。该会自1937年正式在殖民地政府注册后，便接受三江会馆会长杨惺华邀请，以“大三江旗帜”为共同认同基础，期望两者能在“为国家社会服务”的共同目标下展开合作。<sup>[59]</sup>除华北人士，“大三江”这一新地缘纽带亦号召两湖人士融入三江社群。两湖会馆自1947年成立后不久便以公团身份出现于三江会馆组织的活动中。<sup>[60]</sup>1964年，两湖人士邀请三江会馆会长王相贤为南洋湖北天门会馆之成立仪式剪彩。王相贤致辞道：“欣庆该会之成立，使得三江会馆又增多了支生力军，……相信三江会馆以后对同乡福利工作及对社会之贡献将更有建树。……将来对三江会馆之贡献也必更大。”<sup>[61]</sup>这既是对两湖会馆融入三江体系的认可，也是对三江认同延续和发展的展望。通过从“小三江”到“大三江”概念的演化，三江领袖成功地将地缘纽带转化为一种动态的文化象征，并以“三江”符号嵌入社团宗旨，深植于广大会员的价值观中。随着三江社团的持续发展，三江认同成为不可缺少的凝聚三江社群的力量。

## 四、结语

从19世纪末的“少数民族”，发展为20世纪中叶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重要帮群，三江社群以灵活

的策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其不仅通过总会—公团联络机制巩固内部的组织体系，还通过与总会及其他社群的合作拓展社会网络与话语权。三江公墓的修建和祭祀仪式强化地缘纽带的传承；三江公学的创办则通过教育将三江文化与价值传递给后代，同时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塑造三江作为文化象征的认同；而三江社团的扩展和合作进一步推动三江认同地域范围的扩大，形成跨区域甚至国际化的社会网络。

然而，随着社会变迁与国家政策的调整，三江社群也面临认同延续的挑战，无论是因语言政策而停办的三江公学，还是因土地开发而被征用的三江公墓。这种在文化传承与现实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的张力既体现移民社群在融入本地社会中的适应性，也揭示了身份认同构建过程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时至今日，新加坡业已摆脱殖民地身份，转而建立起多民族共存的现代化国家。在此趋势下，关于“外江”的故事与帮群传统随着世代更替一并成为新加坡人的历史记忆，而“外江之众”的后裔们仍继续为三江人谋求福祉，为三江社群传承故事。三江移民认同建构的过程，可视为华人次群体认同建构的一个案例，体现了不同华人群体在地适应、生存、发展的多元景象，丰富了东南亚华人认同研究。

#### [ 注释 ]

- [ 1 ] 《三江帮人士任副会长商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南洋商报》1965年3月9日，第5版。
- [ 2 ] 《七大会馆发起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联合早报》1985年12月12日，第1版。
- [ 3 ] 详见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周敏主编:《长为异乡客? : 当代华人新移民》，新加坡: 八方文化创作室, 2021年; 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 4 ] 详见 Steven B. Miles, *Chinese Diasporas: A Social History of Global Mi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Soon Keong Ong, *Coming Home to a Foreign Country: Xiamen and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1843–1938*,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 [ 5 ] 详见朱庆:《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对待清政府及革命党的态度(1906–1912)》，《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22年第2期，第43–60页; 蔡佩蓉:《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 1877–1911》，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2002年; 等。
- [ 6 ] 详见林孝胜:《新华研究: 帮权、人物、口述历史》，新加坡: 青年书局, 2010年; 曾玲:《越洋再建家园: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年。有关非正式的政治权力概念详见颜清煌:《海外华人世界: 族群、人物与政治》，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2017年，第52页。
- [ 7 ] 详见黄贤强:《跨域研究中国侨领与东南亚华人社会》，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3年;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 本土情怀·局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等。
- [ 8 ] 《新嘉坡三江会馆订本月十日召开选举大会》，《南洋商报》1935年8月7日，第8版; 《“三江”不是江》，《联合晚报》1987年9月15日，第22版。
- [ 9 ] “Chinese Immigration, *Straits Times Overland Journal*, 21 September 1878, p. 1.
- [ 10 ] “A QUARANTINE DIFFICULTY”,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 Weekly )*, 21 September 1899, p.3.
- [ 11 ] 新加坡三江会馆:《三江百年文化史纪念特刊》，新加坡: 新加坡三江会馆, 2001年，第20页。
- [ 12 ] Tham Yuen-C, “Shanghainese Enjoys Mini Revival in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26 January 2017, p. 8;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材料: Ng Chee Seng: 000444/29。
- [ 13 ] 《三江百年文化史纪念特刊》，第54页。
- [ 14 ] 《华人与马来亚华人南来先锋移民是否将减少》，《南洋商报》1929年4月8日，第5版。
- [ 15 ] 《三江会馆新会所落成开幕》，《南洋商报》1973年12月2日，第9版。
- [ 16 ]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南洋年鉴》，南洋协会台湾支部, 1929年，第583页; 傅无闷等编:《南洋年鉴》，

- 新加坡：南洋商报，1939年，第子17页、第辰34页。
- [17]《三江百年文化史纪念特刊》，第77页；《新嘉坡温州会馆十五周年纪念盛况》，《南洋商报》1936年2月9日，第5版。
- [18]《新加坡温州会馆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温州会馆，1953年，第32页；山口哲南：《新加坡华人同乡会与宗亲会之研究》，台北：文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3年，第29~30页。
- [19]《中华总商会新章程较旧章已大加改革》，《南洋商报》1933年8月24日，第6版；《中华总商会下届新董事会选举积极进行筹备》，《南洋商报》1965年1月6日，第5版。
- [20]《新加坡温州会馆三十周年纪念特刊》，第32、36页。
- [21]《三江百年文化史纪念特刊》，第110页。
- [22]有关群帮与方言群的联系之研究，可参见：《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此书首次出现，请补充作者、出版社、出版地、时间等信息第57页。
- [23]详见《三江会馆百年史》，新加坡三江会馆：[http://www.samkiang.org/?page\\_id=11](http://www.samkiang.org/?page_id=11)，2025年10月23日浏览。
- [24]《三江六公团第二次启事》，《南洋商报》1938年5月7日，第6版；《三江帮七团体联席会议》，《南洋商报》1940年4月5日，第5版。
- [25]《中华总商会筹备欢迎新督》，《南洋商报》1934年10月18日，第5版；《星洲百余侨团欢迎高总领事》，《南洋商报》1936年11月5日，第5版。
- [26]《三江会馆筹划集体疏散进行调查同乡人数》，《南洋商报》1941年3月6日，第10版。
- [27]《杨惺华遗体今日出殡三江会馆属下九公团昨晚联合公祭》，《南洋商报》1953年4月21日，第6版；《三江会馆联合属下公团举行盛大联欢宴会庆邵仁枚等获勋衔》，《星洲日报》1965年6月25日，第7版。
- [28]《团结周社团代表大会》，《南洋商报》1964年11月19日，第6版。
- [29]《三江会馆续捐二千五百元充纪念碑基金》，《南洋商报》1966年7月12日，第14版；《概述重建新会所落成经过》，《星洲日报》1973年12月2日，第18版。
- [30]《扩大中华总商会组织建议》，《南洋商报》1946年9月25日，第1页
- [31]《公债劝募委员会发起人宣言》，《南洋商报》1928年9月21日，第16版；《新嘉坡豫陕甘三省旱灾筹赈会》，《星洲日报》1929年3月8日，第8版。
- [32]《中华总商会新章程》，《南洋商报》1933年8月24日，第6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大厦落成纪念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64年，第174页。
- [33]《中华总商会昨日举行会长董就职典礼》，《南洋商报》1935年3月17日，第6版。
- [34]《南洋商业考察团抵星后侨团热烈欢迎》，《南洋商报》1936年9月22日，第5版；《新嘉坡筹赈中国水灾会》，《南洋商报》1935年8月20日，第5版。
- [35]《中华总商会为加强组织扩大征求新会员》，《南洋商报》1949年7月27日，第5版；《中华总商会昨董事会会议》，《星洲日报》1955年11月30日，第5版。
- [36]《中华总商会昨日常年大会》，《南洋商报》1957年3月2日，第5版；《中华总商会增加“新血”》，《南洋商报》1957年11月11日，第5版。
- [37]《中华总商会明日选举》，《南洋商报》1958年1月12日，第5版。
- [38]《中华总商会新董事选举》，《南洋商报》1958年1月14日，第5版。
- [39]《中华总商会新董事选举》，《南洋商报》1958年2月7日，第5版；《一九五八年中华总商会议务报告书》，《星洲日报》1959年3月2日，第8版。
- [40]《中华总商会决促请政府实施强迫投票制》，《南洋商报》1958年2月1日，第5版；《三江会馆致函商会未提集体退会威胁》，《星洲日报》1958年2月5日，第8版。
- [41]《中华总商会新董事选举可能展期开票》，《南洋商报》1958年2月7日，第5版；《开票前辩论历时二句钟》，《星洲日报》1958年2月10日，第6版。
- [42]《总商会下届董事会选举订明年二月间举行》，《南洋商报》1964年9月17日，第5版。
- [43]《总商会新入会者纷纷撤销申请》，《星洲日报》1964年10月15日，第5版。

- [44]《三江会馆设盛宴庆贺汤景贤任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南洋商报》1965年3月24日，第8版。
- [45]《功在社会誉满三江》，《南洋商报》1965年3月22日，第6版。
- [46]《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筹备委员》，《南洋商报》1930年12月29日，第6版。
- [47]《中华总商会联各社团欢迎英皇子莅坡提灯会》，《南洋商报》1929年4月12日，第6版。
- [48]《三江会馆昨日午前开会欢迎东亚体专南游队》，《南洋商报》1935年2月11日，第7版；《新嘉坡三江会馆欢迎王正廷博士》，《南洋商报》1935年3月11日，第2版。
- [49]《全民投票近在眉睫》，《南洋商报》1962年8月26日，第5版。
- [50]《杨惺华遗爱在人间》，《南洋商报》1953年8月31日，第5版；《雪三江会馆昨揭幕》，《星洲日报》1956年5月6日，第9版。
- [51]《推动组织三江总会星代表团抵达首都》，《南洋商报》1964年12月30日，第12版。
- [52]《三江会馆在光阴流水中》，《星洲日报》1981年12月3日，第5版。
- [53]《成立三江公学》，《南洋商报》1928年1月7日，第3版。
- [54]《永和艺术团南洋第一第二团筹赈兴学演技五夜》，《南洋商报》1928年6月23日，第6版。
- [55]《三江公学筹款游艺会盛况》，《星洲日报》1952年12月3日，第5版。
- [56]《三江公学复校三周年举行运动会》，《南洋商报》1954年3月29日，第8版；《三江公学复办七周年举行展览会》，《南洋商报》1958年6月30日，第6版。
- [57]《本坡三江公学校长人选已定》，《南洋商报》1935年6月28日，第6版。
- [58]《闲话华侨团结》，《南洋商报》1950年7月20日，第5版。
- [59]《三江百年文化史纪念特刊》，第58页。
- [60]《三江会馆十团体》，《南洋商报》1951年9月21日，第5版。
- [61]《南洋湖北天门会馆在王相贤主持下举行隆重开幕礼》，《星洲日报》1964年2月16日，第8版。

[责任编辑：张焕萍]

---

## · 书讯 ·

###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出版

由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1965—2017）著、潘一宁译的《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一书近期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华人移民研究领军人物亚当·麦基翁提出，现代边境管控体系是从19世纪白人移民国家排斥华人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它最先被美国应用于华人的一套边检流程及排斥措施，随后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实践。它在加剧亚洲移民所受压迫的同时，也促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及其不平等秩序的形成。本书融合了亚洲移民外迁的关键脉络、边境立法及其实质、强弱关系下的东西方交往、主权与自由迁徙权之法理争论等多重面向，细致呈现了边境与跨境迁移两者互动和互构的历程，展示了移民管控从原则到实施的复杂细节，追溯了国际秩序和文明修辞的不平等源头。